

忻州文旅季：专家探讨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报记者 冯朝晖

黄河、长城、太行山，世界遗产五台山、“中华第一关”雁门关、长城与黄河交汇的老牛湾，忻州古城、黄酒之乡、杂粮之都……坐拥得天独厚文旅资源的山西省忻州市，正在努力探索一条以文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前举办的2024山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化旅游季上，来自政府、学界、企业等各界代表，围绕开放、融合、创新的主体，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当前，宏观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动、国际风云如何变化，老百姓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旅游要素，预示着未来有巨大的文旅消费市场。”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表示。正如忻州文旅季启动仪式上，瞭望智库发布的《2024最具潜力文旅城市报告》推介的威海、忻州、自贡、崇左、宜昌、红河州、秦皇岛、延边州、梅州、江门、西宁、齐齐哈尔等12座城市一样，当前全国各城市竞相发掘独具特色的文旅潜力，在文旅融合方面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崇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霖分享了“风情边关”崇左的发展经验。崇左市通过优化文化

产业布局、深化旅游合作、细化公共服务保障、强化媒体创新，全力打造壮美边关、魅力崇左品牌。

威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杰带来了“度假天堂”威海的文旅思路。依托独特山海优势，威海市把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动能摆在首位，塑造文旅发展新优势。主要思路包括：站在游客角度考虑问题，让游客充分感受城市温情；聚焦品牌创新，持续升级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副市长尹朝晖带来了“长白山林海”延边的“出圈”经验。今年上半年，延边接待国内外游客16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8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延边经验是：突出整体谋划、项目驱动，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聚焦业态创新和供给优化，焕新升级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

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伟分享了“云上梯田”红河推动高质量旅游的思路。一是以特色街区为代表，打造国家级休闲街区，二是以紫陶礼为代表，打造国家级文化旅游聚集区，三是以碧色寨为代表，打造时光之旅，四是推

出高质量研学之旅，五是与高校深度合作。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孙若风介绍了如何在融合发展中打造文旅品牌。首先，文旅发展最重要的机遇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其次是文旅融合，既包括与消费品产业、装备制造、建筑业、信息业、特色农业等各行业的融合，也包括与文化信、图书馆、博物馆、非遗传承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的融合。三是城乡融合，借助文旅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四是文化科技融合，用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生产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实现文创和科创的交汇。

面对持续强劲的文旅热潮，业界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和冷静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围绕“高质量”这个关键词，提出了文旅发展的“四高”内涵，即高品质、高效率、高效益、高韧性。他认为，文旅的高质量之路关键在于守正创新，既守人文之正，把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又要创产业发展新路，通过拥抱现代科技，强化传播体系、创新营销思路，以及链接外部“大脑”、资本力量等，把文旅资源转化为

文化资产。围绕另一个关键词“出圈”，他提出，文旅“出圈”就是要走出舒适圈，改变过去靠门票赚钱、靠财政补贴的模式，让市场机制在旅游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名誉院长张辉教授认为，文旅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做到“出圈”不“出轨”。应紧扣国家旅游发展精神和“双碳”战略目标，守绿色旅游发展之正，守建设有文化目的的旅游体系之正，守创造旅游学习方式、成长方式、生活方式“三式”发展之正。出圈就是创新，通过统筹“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使旅游从有意思转向有意义，通过旅游与相关产业和要素的深度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构建现代化旅游空间体系、产品体系和产业体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区域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唐承财认为，打败自己的不一定是同行，很可能是跨界，与其被跨界的人打败，不如主动融合，迎接跨界优质人才，要敢于主动吸引高端创新人才、敢于创新跨界融合。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晓龙表示，“出圈”不是旅游人跳出旅游行业，而是跳出旅游产业本身，向更大产业空间寻找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事业和产业做大做强。他认为，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需要时间慢慢积累，需要默默无闻、久久为功地打造一个旅游目的地，不是仅靠营销宣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市东城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波认为，真正做到守正创新，需要让游客知道到目的地了解什么、熟悉什么、掌握什么、体验什么、感受什么，最后回到家里跟亲戚朋友分享什么。

此外，来自企业界的代表畅谈了工业与旅游结合，开发沉浸式旅游项目；关注美食、技艺等地方文旅资源，开发特色伴手礼，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文旅质量等建议。与会者的真知灼见，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思路，让文旅融合行稳致远。

推进文物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雁门关

乡村振兴 问计长城

本报记者 冯朝晖

今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他们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代传下去。在日前举办的2024山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旅季活动中，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内蒙古两地社科院、山西省长城学会以及忻州市长城保护一线的代表，展开了一场以“乡村振兴，问计长城”为主题的智库圆桌会。大家就进一步发掘长城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促进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分享了诸多思考与做法。

山西长城精华在忻州。作为长城资源大市，忻州市14个县(市、区)中的13个有长城遗存，长城年代从战国跨越至明清，绵延1000多公里，形制丰富，风格多样。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名单中，忻州的四段长城榜上有名。万里长城内长城的外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都在忻州市内。代县的雁门关素有中华第一关的美誉，这里曾留下昭君出塞、杨家将镇守的传奇故事。如今经过修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雁门关，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历史的兴衰变迁，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宁武县的宁武关，处在“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要地，如今古关活化利用，实现了从军事要塞向旅游胜地的转变。偏关县的偏头关，位于黄河入晋南流的转弯处，曾经的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蜕变为历史沧桑与民俗休闲并存的古韵老城，吸引着八方来客。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子文，从忻州长城的珍贵性、连续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出发说到，忻州长城的文化遗存不是其他城市拿得走、用得着、羡慕得来的资源。他认为，忻州应抓住机遇，努力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上下功夫，把长城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资产。比如注重自然风光与长城联动，军事故事与长城联动、武侠小说与长城联动，历史典故与长城联动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林生，提出了三条长城文化开发路径，希望助力忻州从长城资源大市转向长城文化强市。一是注重将长城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二是注重利用现代化创新和创意，打造文化IP，将长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三是注重长城文化与体育、旅游、科技融合发展，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他认为，旅游行业“吃住行游购娱”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带动区域“出圈”，要打开思路，通过提供有人情味、有情调价值的文旅产品和服务，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欣赏长城之美，体悟长城之魂。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翟禹，结合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带文旅产业发展，提出了统筹乡村振兴和长城保护的“四新”方案。一是古堡新颜，打造古堡文化品牌，用新讲法讲好传统故事、历史故事；二是古村新兴，开掘古村文旅价值，赋能乡村振兴；三是古道新途，挖掘古道区位优势 and 交通价值，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四是古风新篇，推动民间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文明浪潮



老牛湾

中续写新篇章。

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山西省长城学会副会长王杰瑜，从长城区域与乡村振兴关系出发，提出三点思考。一是长城区域乡村是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应有机结合；二是长城景区乡村大多乘长城相关政策东风实现了乡村振兴，应继续用好政策，助力乡村振兴。三是强有力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为长城保护注入强劲动能和活力。

偏关县老牛湾村原党支部书记，山西省十佳最美长城卫士吕成贵，分享了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典型实例——老牛湾。偏关县老牛湾村是长城脚下的小村落，长城和黄河并行，景色壮观，通过“项目强村，旅游富民”，发展长城旅游，老牛湾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旅游，实现了乡村振兴。目前，老牛湾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院、四五孔窑洞，人人有事干、有钱赚。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忻州市长城学会副秘书长、忻州市长城保护研究十大杰出人物杨雨帆，结合忻州著名关隘宁武关的区位特点，提出了当地统筹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的侧重点。她认为，重头戏应放在大水口村，因宁武关就建在大水口村。她说，该村现在有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经过，地理位置离宁武县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很近，区位优势突出；同时，该村传统村落历史遗迹丰富，有原汁原味、保存完好的大水口谷，是难得的文旅资源；此外，该村还有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土筑长城，发展文旅潜力巨大。

崞岗县政协副主席、崞岗县文旅中心主任、忻州市长城保护研究十大杰出人物杨雨帆，分享了崞岗县统筹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崞岗县宋长城景区开发项目。他说，借助长城旅游公路建设，崞岗县将王家窑的宋代长城和原始村落，以及华北最大的亚高山草甸荷叶坪统筹开发，形成了宋长城3A级景区，提升了崞岗旅游整体品质。还将宋家沟景区和宋家沟口子村北齐长城和军事文化遗址统筹规划，成功建成了宋家沟景区并跻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责任，也是历史使命。统筹乡村振兴与长城保护，将更好促进长城守护，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将这份珍贵财富世代传下去。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西周初年，召公和周公以陕为界，分陕而治。召公过函谷关到陕西巡察民情。他为了不扰民，就在一棵甘棠树下现场办公。渴了，饿了，他就摘几个棠梨吃。人民为了纪念召公亲民爱民的美德，写下了《诗经·甘棠》。由此，历代文人骚客，途经崤函古道，做官、寓居、探友、赏景都留下了很多诗作。其作者包括王侯将相、封疆大吏、文人雅士、逆旅游客，等等。他们在这里感慨往事，赞美景色，怀念亲人，送别朋友，惊叹险途……以表达情感、诉说故事。其诗作无不发自肺腑，真切动人，意真情切，感人至深。这些诗，时间上跨越3000多年，空间上布满了西至陕西潼关、东达古都洛阳的城乡沿途，使崤函古道形成了一条通古今、贯穿东西的诗文化走廊。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形成的地理和人文基础

“崤函”一词，是崤山和函谷的合称，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东有崤函之固”。“崤”，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它西与秦岭华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北接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障碍，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匣子)”而得名，其设置在战国初期的秦国时期。崤函古道指崤山和函谷所在的区域，东至河南洛阳，西至陕西潼关，全长约500华里。崤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自潼关至陕州以西为函谷道，自陕州至洛阳为崤山道。崤山道又分为北崤道和南崤道；此道在陕州城东的交口向东，又分为南北两条崤道，北崤道过交口、硤石、观音堂、沿涧河河谷经澠池、新安东行，出汉函谷关至洛阳。南崤道过交口后向南，过雁翎关，沿永昌河南行，再沿洛河经宜阳，东行至洛阳。

当然，仅有地理优势，并不能成为人文通道。崤函古道的形成和发展，还与我国自古以来东西方政治、经济和都城格局的演变也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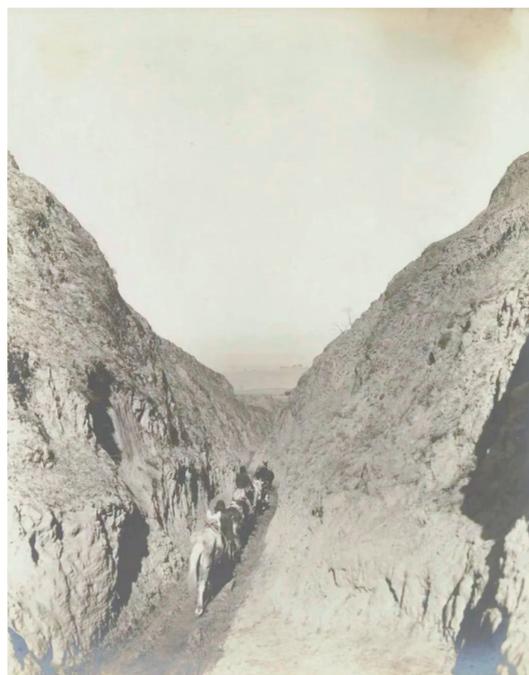
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中国处于由部落到古王国的过渡期，文明集中在以河、济、淮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国在地理上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别，夏与周属于西，夷与商属于东，这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起源于西部的周朝，通过东征消灭了商朝之后，为了防止东部部落的叛乱，于是在崤山以东，河水和洛水之间，营造了成周洛阳城。洛阳便成为了西部宗周镐京的陪都，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两京制”。从此往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住往都不止一个都城，长期存在着两京制。从西周经汉、到隋、唐，王朝基本上都是长安、洛阳的“二人转”，而且往往是长安为主，以西控东。虽然东晋开始出现南北分裂的插曲，但是尚未改变东西划分的主旋律。处于两京之间的崤函古道，自然就担当起了交通要道的角色。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的特色

一是时代性。从《诗经·甘棠》开始，历经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至近、当代，崤函古道上都有诗作留下，特别是唐宋时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仅唐代在崤函古道上创作的诗歌就有1300多首，作者有400多人。从唐代的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李白、杜甫、韩愈、贾岛、李贺、白居易等，到宋代的苏轼、魏野等都有佳作留下。这种景象与我国文学史发展，特别是唐宋词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高度契合。尤其当代之时，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雄起，董必武、郭沫若、郭小川、贺敬之等在三门峡都留

崤函古道——贯穿古今、沟通东西的诗文化走廊

侯俊杰



函谷关古道老照片



世界文化遗产——石壕古道 张雷儒/摄

下了一部部不朽的诗篇，更是记载了新中国治黄史上开篇的华章，歌颂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二是真实性。崤函古道位于两京通道上，是洛阳和西安往来的必经之地，所以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件。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直接写崤函古道上的事和故事，莫过于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唐乾元元年(758—759年)，杜甫在从长安到洛阳的往返途中，目睹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给国家带来的凋敝，睹景生情，写了这三篇不朽名作。这三首诗，不仅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零的灾难，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表达了作者对饱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同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它们所写的地方，都在崤函古道上：古新安城，在今三门峡所属的义马市；石壕，在今三门峡陕州区石壕镇；潼关，即今陕西东部的潼关县。《三吏》，是杜甫在崤函古道上留下的不朽之作。此外，王建写于陕州的《水夫谣》，仿汉乐府的形式写出了水上服役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对当时不合理的劳役制度进行了抗争。杜荀鹤过硤石写下的《伤硤石县病叟》“无子无孙一病叟，将何筋力事农耕。管家不管管管地，须勒王租出此中。”记录了一个无子无孙的生病老人已经无力去耕种荒芜的田地，但官府不但不管其痛苦，还要按照土地多少征收租税的苦难。这一幕幕场景，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三是丰富性。由于崤函古道上的诗作者身份的复杂，所处社会地位、环境的差异，所以其作品也多种多样。有人记下了当时社会的苦难，如上述王建、杜荀鹤的诗；有人记下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如杜甫的《石壕吏》；有人感伤，如号称“大历十才子”的卢纶在虢州任职期间，爱女元樊不幸离世，他写下

的《哭女樊四十韵》和《哭女樊》，读起来不禁让人落泪；有人怀古，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入潼关》：“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冠盖往来客，风尘朝夕惊。高谈先马度，伪晓预鸡鸣。弃繻怀远志，封泥负壮情。别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此诗名为《入潼关》，实则写的是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与崤函大地上的历史典故。当然，由于崤函古道两旁地险景美，过往之人，自然会有感而发，赞美美景。如唐太宗的《春日登陕州古城》、魏征的《砥柱铭》、李商隐的《荆山》、韩愈的《奉和魏州刘给事使君三堂题二十一咏》等都是对这里的自然风光和黄河之雄浑壮美景色的赞美。

四是艺术性。我们不能苛求崤函古道上流传下来的每一首诗都是艺术佳作，但是这些作品，能够流传下来就有一定的史料和艺术价值，其中也不乏艺术精品。杜甫的《石壕吏》就是唐代诗坛上不可多得的一篇。“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怒”“苦”，既表达了对吏的恨，又表达了对村妇的同情。全诗一百二十个字，用惊人的简洁和洗练，就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子由澠池怀古》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代表作之一。北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陕西任凤翔(今陕西宝鸡)府签书通判，过澠池时收到弟弟苏辙写的《怀澠池寄子瞻》诗，提到六年前他们父子三人赴汴京应试路过澠池时的情景，苏轼以此诗回复。诗中表达出对人生纾解旷达的感悟，而其中用“雪泥鸿爪”来比喻人生轨迹，既形象生动，又寓意深远，至今已经演化成一个成语流传下来。魏野，是北宋陕州人，号称“草堂居士”，一生清贫，不谄权贵，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与隐士之一。他常居陕州，写下了很多与陕州有关的诗句。其中的《寻隐者不遇》四句诗中有一句“白云遍地无人扫”，想象奇特，画龙点睛。不写清扫尘埃而写白云，既写出其身处之高，又写出清扫对象之不可理喻；既表现出诗人隐世独处的清高，又写出诗人亦人亦仙的心境。至于到了当代，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工程建设和诞生，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三门峡》、郭沫若的《三门峡八章》等都成为当代诗坛上的名作，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对三门峡天险的描写和对大坝工程的讴歌，又是歌颂新中国治理黄河的华丽篇章。

崤函古道诗文化走廊的时代意义

崤函古道，史学界又称“黄河廊道”。崤函古道上的诗词文化是崤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是研究崤函文化、三门峡历史文化乃至黄河文化重要的历史资料。在今天，它们也是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文旅融合，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展新时期旅游业的宝贵资源。时代呼唤三门峡结合文旅发展的实际，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激活它们的时代价值，让它们为新时代文化旅游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参阅刘书芳编著的《三门峡古代诗词解读》，谨表谢意)